

张秀兰：突围中看着儿子病死也不影响丈夫

口述：张秀兰 记录：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 陈寒冰 摄影：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 吴小兵 陈寒冰

人物档案

张秀兰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22年3月
抗战经历：1941年1月，山西新军供给处；1942年1月，晋绥二分区供给处。



扫一扫，听抗战女兵讲过去的故事

走近张秀兰家时，他儿子说：“昨天我妈妈才给一些年轻学生讲了抗战故事，今天一早就在客厅等你来呢！”

93岁的张秀兰，出生在山西省保德县，18岁报名参军后便与部队结下了深深情缘。现在虽然年事已高，耳朵也不是特别“好使”，但张秀兰一直坚持坐在沙发上，靠儿子的“翻译”给今日女报/凤凰网讲述抗日的那段历史。采访中，她的手里总抱着一个饭盒，这是她和丈夫朱明芝抗战时用得最多的东西，她一直认为这是两人抗战的纪念。

经历几十年的风雨，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比起抗战时候的那些战友，我活到现在，很幸福了，很满足了！”

“亲眼看见日本鬼子砍下邻居的头”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新军概况》记载，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省出现的一支新型的抗日革命武装，它名义上归属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山西军队系统，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一直领导的属第二战区晋绥军建制的一支抗日部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

山西新军在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游击战的同时，为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从百团大战到抗战胜利，山西新军都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1940年春天，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仍保留晋绥军番号，实际已加入八路军的序列。抗日战争胜利后，山西新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参加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我出生在山西保德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到我懂事的时候，日本鬼子大举入侵，家乡沦陷，从此过上就像亡国奴的生活。我还记得亲眼见到邻居的一位叔叔无缘无故被日本鬼子砍了头的场景。那时候一提到日本鬼子，除了害怕更多的就是恨！

我有个哥哥，加入了八路军，我很喜欢听他说与鬼子周旋的故事。每次听到他说的那些英勇事情，我就特别羡慕，因此，年少时八路军就是我最厉害的人。随着鬼子不断进攻我国，我们住的村子里也开始宣传参军抗日。有一天，哥哥回来对我说“你很聪明而且能干，不应该躲在家里，也应该去参加战斗打跑鬼子”。因为哥哥的鼓励，参军打鬼子的想法就在我心里发了芽。

1941年正月初六这天，我听说村里来了招兵的人，于是立即跟着邻居一起去报名。去报名时，填表工作人员问我们为什么来参军，我记得有人说当兵有饭吃，也有人说是在家里被打想出去，我当时就说“我要和哥哥一样，去



丈夫抗战时用过的饭盒，张秀兰一直保存至今。

打日本鬼子为保卫国家”。于是，不满19岁的我就这样入伍了。

知道我要去参军时，家人很不舍，但我却好开心啊，总觉得自己终于能做大事。按照部队安排，我进了山西新军供给处被服厂，最先安排给我的工作，就是给战士们做棉衣棉被和鞋袜等生活用品。

在被服厂里聚集了新进来的女兵，虽然大家年龄都不大，但想着前方战士没有衣物过冬保暖，大家都自发不停不休地工作。每天基本都是早上天一亮就干，到夜晚挑灯夜战，一天十多小时连轴转。每次吃饭的时间，就会播放一些“天气越来越冷，前方的战士没衣穿，他们都要靠我们来渡过难关，加油干为他们送温暖”等宣传口号，所以我们总是三两口快速吃完黑豆或糠饼，就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工作。

我在供给处呆了一年时间，从最初只能简单给其他人打下手，到一天可以拧六七十根麻绳。那段日子，我的女红技术是大有长进。

1942年，因被服厂调动，我被划分到了晋绥二分区供给处，我们被安排在当地的烂窑洞里继续工作。那些窑洞没有门窗，冬天里冷风嗖嗖地吹，我们女工大多都是满手冻疮，我的手则经常流血水。当时带领我们的队长说“手冻坏了，大家就慢点做”，可是一想到前方战士们需求，大家还是忍着痛继续干。

那时候女工们还有一个最难熬的事就是来例假，天寒地冻时来了例假，没有合适的东西可用，我们只能用破布包包裹着树皮里层纤维，然后在窑洞里一站就是十来个小时，私处和大腿被磨破是常事。虽然大家都抱着快点为

前线送衣物的心思，但因为环境太过艰辛，还是有很多女工偷偷躲起来哭。其实那时候我也一样很想哭，但我总是想，虽然我上不了前线持枪杀敌，但在后方生产支援前线，同样为胜利作出了贡献。也靠着这股劲，我一直守在窑洞里认真工作。

大儿子战时夭折，丈夫却不在身边

抗战时期，在被服厂里工作的女孩子，心思都很单纯，如若不是旁人介绍，很少会有主动谈恋爱的。通过介绍结婚时，仪式也很简单；而且，就算结婚了，她们中不少人也不能随军与丈夫一起生活，而是留守后方的家属队。她们怀孕了，有时也不会告诉丈夫，怕他们分心。更多的时候，她们往往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历经磨难。



这是张秀兰获颁的抗战胜利60周年奖章。

在被服厂里，邢政委等领导对我们这些年轻姑娘还是很照顾的，其间还多次问我有没有对象。而那时候我们女孩子的心思也都都很单纯，若不是旁人介绍，很少会有主动谈恋爱的。

1944年初的一天晚上，邢政委找到我，问有没有想过成家的事。初听到这样的话，我脸一下子就红了。邢政委接着说：“我有个朋友在游击队打仗多年，现在快40岁了还没老婆哦，你愿不愿意和他见面接触下？”

就这样，从没谈过恋爱的我，第二天就和大龄游击队大队长朱明芝见了面。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虽然出老但人蛮老实。我们俩简单聊了几句，相互说了下自己的家庭情

况，我才知道他是从湖南来这边抗日的老红军了。见面后，邢政委就和我谈，朱队长对我的印象很好，问我愿意结婚不？于是就隔了几天，我们俩就简单地把婚事办了。然后，我就跟着丈夫朱明芝去了他工作的保德县。

虽然说我们是结婚了，但那个时候他负责征兵训练，又被派到了甘肃，我就被安排在后方的家属队，两人几个月也见不上一面。结婚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不给老朱添包袱，我都没告诉他怀孕的事。直到有一次他回家看到大肚子的我，盯着肚子好久感叹：“真是辛苦你了！”

1944年10月，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当老朱知道这个消息时，儿子都好几个月大了。虽然我和孩子在后方，但依然会被日本人攻击，所以我就只能跟着后方团队四处躲藏。在儿子刚1岁多点，有天晚上又接到通知需要转移，可是当晚儿子突然就出了麻疹，我抱着孩子四处找老乡希望求得帮助。但在那种慌乱的时刻，要找到卫生队真的很难。我就用别人教的一些土方式尝试给孩子治疗，可我再怎么做还是没有救回孩子的命。

其实当晚老朱所在的部队离我只有二十里路，当时我多想能抱着孩子去前方找他，可是我又怕这事会影响部队的整个进程。当我抱着孩子的尸体时，我心里那个后悔和怨恨一涌而上，憋了很久的苦一泻而出，最后哭得眼睛都不能完全睁开了。

我把儿子夭折的消息告诉给老朱时，他的部队正好转移经过我这。当时他的领导说让他在家休息一天陪陪我，可是老朱也就进门安慰了下我，他抱着我说：“孩子以后咱们还会有的，把鬼子打跑了，所有的孩子才能过上平安生活。”

没过多久，老朱还是跟着队伍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时，我忍着没哭但心里还是难过的，就想他怎么不能为我和孩子多留几个小时呢！

虽然很想要孩子，但我和老朱基本没办法团聚，所以直到1947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才出世。

(下转 A04 版)